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朱光潜

ZHUGUANGQIAN ZHUAN

王攸欣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朱光潜 传

朱光潜

责任编辑:孙 牧 陈鹏鸣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光潜传/王攸欣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

ISBN 978-7-01-009806-7

I. ①朱… II. ①王… III. ①朱光潜(1897~1986)-传记 IV. ①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7788 号

朱光潜传

ZHU GUANGQIAN ZHUAN

王攸欣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凌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6.75 字数: 430 千字

ISBN 978-7-01-009806-7 定价:6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扶持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自序

近来读《庄子》，有一些新的感悟，也觉得其要义与生存论哲学有相通处。庄子昭文鼓琴的寓言，实质上涉及人的认识和生存的基本问题：“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他所谓亏，是相对于他想象中的声音全体而言的。一旦鼓琴，使一些声音凸显出来了，尽管声音可能很美妙，却使更多可能存在的声音处于不显状态。人的认识也是如此，当我们的意识去关注世界，显现世界时，一方面是对世界某些东西的凸显，是对这些事物的某些方面的凸显，但另一方面是对其他事物、这些事物的其他方面的遮蔽。譬如我们的意识关注眼前一本特定的书——《南华真经注疏》——的时候，此书的封面特征比较清晰地显示出来了，但此书封面以外的一切成为它的背景，成为意识的边缘性因素，相对比较模糊，甚至不能显现，不管是与这本书摆在一起的其他书，还是这本书所放置的书桌及整个房间，还是不在现场的与此书有关联的研究著作或没有直接关联的其他著作以至语言、文化、社会、自然的所有存在，甚或此书的实际内容，都处于不被充分显现的状态。而我们对于世界，对于意识对象的这样一种显现过程，又是我们自己开创、显现自己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开显了自己在某些方向上生存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阻塞了生存开展的其他可能性。按庄子昭文鼓琴的寓言这样去理解世界，则我们对于任何对象的研究，都是我们生存开显可能性的封住，我们只能为保存混沌完整的发展可能性而寂寞无为了。然而，如果仅仅这么去解读《庄子》文本，则又背离了庄子选择以重言、寓言、卮言的方式来进行言说的用意，更背离了庄子以不断超越的眼光来理解、言说世界的根本精神了。庄子的文本表达及其寓意与他

选择文本表达的这种以言为行之间似乎存在着相当复杂的纠结甚至悖反，我们只有以超越任一特定立场的眼光去领悟，才能把握其精神。如果说声成则声亏，那么庄子的文字表达就不具有显现世界的价值，而庄子恰恰选择了以文本的方式开显他自己以及他所理解的世界，事实上成就了中国文化的深弘与超越，对于提升人生境界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当然，在不同的文本解读中，也有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所以，任何对于对象的显现，对于自己的开显，都是有意义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去超越既成的一切显现方式，达到知通为一、与道一体的境界，才是庄子的理想。我也想这么看待我的朱光潜研究。

朱光潜研究已经构成我学术生存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在我自己看来，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在这部我较全面地理解、叙述朱光潜一生的《朱光潜传》出来的时候，我也想回顾一下自己与朱光潜遭遇的因缘。

我最早接触朱光潜先生的著作，是1980年代。他当时因为重提人性论话题，又当选为影响甚大的美学学科的第一届中华美学会会长，在学术界声名鼎盛。他的《西方美学史》作为高校美学史统一教材，是中文系必读书。我看了这部书关于康德、黑格尔、歌德等的几章，觉得他的阐述清晰透彻，明白易懂，有大家风范。只是对于他总是“辩证地”评价他们的观念略觉不甚称意。他之美在主客观统一的观点，是通过讲授美学的教授知道的——那位老师在美学界亦称名家，不过却是朱光潜美学的严厉批评者，举出朱先生的主客观统一论作为靶子，不提其实践论美学，也不谈其早期的观念，宣称朱光潜的观点绝非马克思主义。他认为朱光潜喜欢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德文原本寻找根据，一些关键词翻译与已有权威译本每不相同，所以朱的研究方法肯定有问题，不可信。显然，这位老师不相信权威译本竟然会有错误，朱光潜又总会发现问题。我只听了两三次美学课，就退堂了。其时，读到才出版不久的朱光潜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本为英文著作）的中文译本，觉得辞气高华，论断谨严，没有当时国内一般理论著作的陈腐气，眼界为之一新。不过那时我对朱光潜的个性、人生经历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所以也不可能充分理解其著作中显示的生存状态以及这部著作的话语方式与其学术话语背景之间的关系。

约 1994—1995 年间,我处于博士论文选题阶段。当时与同门师兄弟张洁(昌切)、王毅时相谈论。昌切先生正在作晚清思想的论题,对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甚感兴趣,倾向于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看他们的成就,谈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对章太炎尤为推许。而我更倾向于从学术史、从西学东渐史的角度去看待近现代学术人物。章太炎学术确有可观,且颇受西方近代哲学影响,也多独见,其佛学渊源甚深,每每借佛家名相表达思想,我不敢去碰繁复深奥的佛学典籍,所以仅读了《章太炎全集》四、五两卷,有所感想而已。先是,读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对乾嘉朴学略有兴趣,选读了几部朴学名著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更读王国维《观堂集林》,也觉深有趣味,只是知道并非自己专业,不可能去研究。后来读单行本《静庵文集》、《人间词话》,对王国维美学与西方哲学、美学的关系有一些想法,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在 20 世纪中国文论史上颇具影响,而学界对境界说的实质性内涵甚多误解,因此想在与西方美学的比较中澄清其内涵,并以王国维为代表,探讨晚清以来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方式及其学术史意义。记得最初想就王国维接受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等几人进行具体研究。开题时,导师陆耀东先生指出,王国维属于近代,与博士点专业方向有一定距离,可再选一两个现代文论家作研究,这样也可以显示中国近代以来接受西学方式的变化趋向。孙党伯、陈美兰等老师一则肯定选题价值,二则也赞同陆师意见,他们还建议可选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人。我因朱光潜是研究西方美学最有成就的大家,此前也多少接触过,对《悲剧心理学》还颇有好感,很自然地选定他作为研究对象。没有想到,阅读朱光潜著作,尤其是读他被一般人视为代表作的《文艺心理学》,过程非常痛苦。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论述难懂——朱光潜的行文风格是文论家中少有的平易浅近、明白易懂,说理也非常清晰——而是由于他接受了各种互不相容的观念,如克罗齐的直觉概念和叔本华的纯粹直观概念,克罗齐的唯理论美学和立普斯的经验论美学,西方观念和中国传统观念,把它们糅合在一起,这就造成了不少在我看来似乎很明显的逻辑矛盾,让我觉得他并没有确立自己的独立立场。一位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美学大家,出现这样的问题,确实令我感到痛苦,而仔细体察其根源,发现这是他承受了西方文化

强势的文化语境和中国现代主流学术话语影响的结果,他内心真实的价值、审美取向相当程度地被压抑、扭曲,从而造成他理论上的不一致。所以我在博士论文《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中,明确地陈述了朱光潜学术中的这种情形,并略带针砭,措辞上亦不无过激之处,这正是我当时文学生存状态的真实显现,那时在我看来,似乎没法以其他方式来呈现我的痛苦。令我深怀感激的是,当时参与博士论文评审和答辩的乐黛云、陆耀东、黄曼君、陈鸣树、王先霏、颜雄、陈美兰、孙党伯、易竹贤、王富仁、刘纳、邓晓芒等诸位先生都以宽厚的学术胸怀,包容了我特殊的生存状态和表达上的不够平和处,给予了充分肯定。邓晓芒等先生尤为激赏,推荐到三联书店,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出版后也得到一些学者欣赏,其中赵园先生等人对我的鼓励尤大。完成博士论文后,戴逸、郑大华等先生主编“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罗成琰先生推荐我写了《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因此尽量搜集了更多的材料。我与朱光潜哲孙宛小平先生联系后,他托卢风先生带给我一批朱光潜的手稿及1930—1940年代与学者作家的来往信件、互赠诗词法书的复印件,其中有些还从来没有发表过。可惜因时间较仓促,虽然注意到了以前没有充分关注、解读的一些文本和事件,对朱光潜学术也有了更全面一点的描述,但在总体理解的深度上,相对于博士论文,并没有太大的超越。

2005年,因钱理群等先生鼎力推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的编辑丁宁女士,约我撰写《朱光潜传》。在电话约稿中,她特意嘱咐我别写成评传——理论性的著作,宜着重传主的人生历程和生活场景的复原。这一次,我不拟仓促成稿,而是细细梳理了朱光潜从读中学时期开始直到晚年的交游,对于和朱光潜交往较密、友谊较深或具有某种特殊关联价值的一些学者、作家如徐中舒、高觉敷、匡互生、方东美、郭斌和、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吴宓、胡适、梁宗岱、李健吾、周作人、沈从文、废名、常风、张颐、叶麀、卞之琳、王星拱、陈源、凌叔华、刘永济、王世杰、熊十力、马一浮、钱穆、程千帆、贺麟、胡乔木、周扬、蔡仪、柳鸣九、朱虹、李泽厚、张隆溪等,我都尽可能阅读他们的文集,阅读关于他们的传记材料和研究成

果。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日记、书信,还特别细致地寻找与朱光潜有关的一切直接记录和背景材料,朱自清、叶圣陶、吴宓、周作人等人的日记,朱光潜未刊的一些书信和友朋互赠法书,为我追寻相关材料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有时朱光潜自己的书信没有保留或公开,但从别人给他的书信中,可以较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情谊和交往语境。我曾读过《马一浮集》中马一浮致朱光潜的信,记得大意,但写作时一时不易找到《马一浮集》,与李清良教授谈及,承他热心过录原信,使我更准确地理解了他们的关系。朱光潜在乐山武汉大学期间,萧军游历到乐山,专门去拜访他——可能因为1937年评1936年《大公报》文艺奖金时,萧军《江上》被包括朱光潜在内的评委会拟定为获奖作品——但《萧军日记》没有公开出版,我专门托葛涛博士到鲁迅博物馆查了《萧军日记》复印件,有两处涉及他与朱光潜的交往,记录甚为细致,对于理解朱光潜之为人颇有助益。另外还请熊权博士在北京大学档案馆查了朱光潜的档案——这一过程让她很费了周折——这也是相当有价值的材料。我了解朱光潜的生活环境,还到武昌、成都、乐山、北京等朱光潜学习、工作、居住、游玩过的地方探访,有具体的场景,想象朱光潜的生活变得更容易、更生动一点。因为近些年的学术积累,我看待世界、看待学术的眼光也有所变化,再读朱光潜本人的著作,读得也更深透一些了,写作本书时,自己觉得已经比较透彻地理解了朱光潜的学术和人格,他每一步人生抉择,每一次学术转向的个人处境、学术话语和意识形态背景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因果关联,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当然,写作中也有一些我反复思考,至今尚未解决的难题。例如要不要为了场景、性格的生动,移用、虚构对话和细节的问题。我的基本原则自然是力求真实,但是真实是有不同层面的,即使有非常充分的史料,要复原某些对话场景,仍然需要细节的虚构,庄严如正史,人物生动传神的《史记》,取材措辞谨严的《三国志》等,也不无细节、对话的移用、虚构。写传记实际上不止是写传主,也应通过传主写出他所生活的时代甚至某个特殊环境或场所的氛围、特点,而这些是作为理论家的朱光潜自己的文本很少提供的,因此颇需借助他的朋友或同时代人的叙述。经过反复权衡,在不背离我对人物个性、精神的理解,也不影响准确理解书中其他人物情况下,笔者偶尔采用了一些虚构的细节和对

话——其中大多数是有文本根据的——希望由此能够为我枯涩的笔墨，增添一点点活力。同时，朱光潜毕竟是学者，是美学家，其理论上的成就，他的学术思路、方法，对于特定的学术话语方式的选择和运用，他几次重要的学术转向及其语境，也是叙述评说的重点，我颇有不同于他人的理解。不过，时过境迁，出版行业的目标和运作规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我快写成书稿时，和丁宁女士联系出版事宜，不料出版社已经停止出版“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了。

2009年，我把基本完成的《朱光潜传》书稿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根据申报要求，请钱理群、邓晓芒、阎真先生写了专家推荐意见。令人欣慰的是，书稿得到了评委们的充分肯定，得以顺利立项，因此，我对至今尚不知其名的所有评委心怀感激，尤其感到高兴的是在学术评价体系受到学界普遍质疑的语境中，毕竟存在着超越个人功利性的评价程序。

去年年底，全书完成，妻子贝京细读一过，补正了不少行文疏漏，甚至还发现了个别引述文字原文的错漏。

感谢责任编辑陈鹏鸣先生、孙牧女士为本书所作的认真编校。

深深感激所有奖掖、帮助过我的人，也诚恳希望读者指正本书疏误不当之处。

王攸欣

2011年5月16日

目 录

自 序	1
小 引	1
第一章 人文化成(吴庄、孔城、桐城、武昌,1903—1917)	3
一、私塾发蒙	3
二、学作古文	13
三、体会文学与文化	18
四、武昌求学	25
五、价值观初成	29
第二章 西学洗礼(香港,1918—1923)	32
一、生活与交谊	32
二、新文化运动冲击	38
三、初涉西学	44
四、寻求超脱现实之路	47
第三章 教育实践(上海、上虞,1923—1925)	51
一、中国公学	51
二、白马湖边	55
三、立达学园	66
第四章 学术转型(爱丁堡,1925—1929)	73

一、赴英旅程	73
二、学术选择	75
三、生活与交往	85
四、初获声名	91
第五章 学术树立(伦敦、巴黎、斯特拉斯堡,1929—1933)	96
一、《文艺心理学》	96
二、交游与爱情	105
三、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	115
四、受聘返国	125
第六章 京派学者(北平,1933—1937)	133
一、旧雨新朋聚故都	133
二、执鞭北大清华	148
三、慈慧殿沙龙——读诗会	156
四、是非纷纭	176
五、主编《文学杂志》	198
第七章 辗转巴蜀(成都、乐山,1937—1946)	213
一、逃难成都,掀起风潮	213
二、乐山交游	228
三、参与校务	248
四、向传统寻资源	255
五、《诗论》	260
六、涵泳陶渊明	268
七、克罗齐译介中的自我超越	279
第八章 转折关头(北平,1946—1949)	286
一、重返北平	286

二、民族性反省	294
三、卷入政治旋涡	300
四、人生选择:去与留	315
 第九章 顺应调适(北京,1949—1976)	326
一、“洗澡”	326
二、屈辱中调适	338
三、美学大论争	344
四、《西方美学史》	362
五、“文革”磨难与学术坚守	371
 第十章 晚年风范(北京,1976—1986)	382
一、突破禁区	382
二、倡导新风与奖掖后进	390
三、老骥伏枥	397
四、回顾一生	402
五、最后岁月	408

小 引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1897年10月14日),安徽省南部安庆府桐城县内,与庐州府庐州县交界处,一个偏僻穷困的小村庄——阳和乡的吴庄,^①一座不大的土砖屋里,洋溢着欢笑和喧腾。这是一家近乎破落的私塾,私塾先生朱子香的妻子左东宜产下了第一胎,是个儿子。这个新生儿个头瘦小,却是天庭饱满,额角广阔,尤其落地的那一声哭,声音嘹亮,显示出强健的生命力,使已经筋疲力尽的母亲感到非常欣喜。新生儿的父亲朱子香,疾步走到厅堂,告诉早在那儿等待消息的祖父朱文涛,父子满心欢喜,满脸放光,他们不约而同的期待是,已近衰落的朱家,会由于这个新生的长孙长子而家道中兴,以至昌盛发达。他们早就考虑,给新生儿取一个吉祥的名字。以他们的人生经验,觉得名字不能太露锋芒,祖父从书籍内抽取《南史》一册,翻到《王昙首传》,看到名士袁淑品评王昙首之子王僧虔,中有“卿文情鸿丽,学解深拔,而韬光潜实,物莫之窥”等语,眼前一亮,与儿子商量,为新生儿取名光潜——光潜寓韬光潜实,即光芒潜藏之义——后来又字之曰孟实,“孟”指在家排行老大,“实”则寓老实、踏实、务实之义,^②也有本真、充实之美的意思。

朱光潜宗族属于桐城会里朱氏,初祖元末从江西婺源北迁至桐城会宫,后在桐城以会里为中心繁衍生息。朱光潜出生时,所属支脉已是书香世家。

① 今为枞阳县麒麟镇阳和乡岱鳌村吴庄。

② 名“光潜”之来源和寓意系本传作者推测,字“孟实”之义则据朱光潜自己的《答〈中国作家笔名探源〉编辑》一文。

祖父朱文涛，字海门，作过贡生，^①能作很好的八股文，却没能在科举之途上更进一步，只得作了塾师。他凭自己的文章和学问，在当地获得了相当的声誉。中年以后，曾被聘为孔城镇桐乡书院教习，并且与当时名气很大，堪称桐城派古文一代名家的吴汝纶，有一定交谊。他的学生中，也有古文出色、在桐城名重一时的陈剑潭。海门先生始终视科举为正途，并不那么看重古文，对儿子朱子香（字若兰，号黼卿）的期待，是能够谋一个正途出身，光大家门，以致光宗耀祖。因此，朱子香承担着父亲期待的重负，对科举考试所要求的策论制艺，弄得精熟，他的八股文在当地也受人称赞，就是不入学官法眼，连县学也没能进——这可能和那时的考试内容，及主考官的阅卷取向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有关。当时，正是几百年的八股取士制度处于重大转折的时代，因为面临民族生存危机，又接触了西方文化，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光绪二十一年发起“公车上书”，上书主要为拒绝中日和议，同时要求朝廷做出重大的制度改革，其中就包括改变科举制度，兴办学校。公车上书影响很大，尽管此时科举考试继续进行——戊戌百日维新曾下诏废除科举，但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而告终，科举考试得以持续到1905年——但考试内容的重心，已由原来主要代圣贤立言的经义，转到畅论时事的策论。朱子香所在的桐城偏僻小村，风气大概比较闭塞，使他难以及时了解时事要闻，甚至恐怕也难以了解科举考试重心的变化，不能中式也是很自然的事。两代人的失落和期待的重负，就落到了作为长子而刚刚出生的朱光潜身上了。

^① 据郭因《朱光潜》，《江淮文史》1993年第1期。朱光潜自己从未在文章中谈及祖父为贡生事。

第一章 人文化成

(吴庄、孔城、桐城、武昌,1903—1917)

一、私塾发蒙

朱子香读了多年的四书五经,作得很好的经义(八股文)和策论,只是经过几次考试,均未能进学,已觉得仕途无望,心灰意懒。虽有几亩薄田,家境还是相当贫寒。家里有读书的传统,桐城的读书风气尤其浓厚,周围的乡邻和他自己,都非常看重读书人的身份,当地私塾老师的地位,相对而言也比较高,他就承袭父亲的衣钵,在家里开办了私塾。全村总共20来户人家,入学的子弟并不多,加上附近村子来就读的几个,一般才十来个学生。正是这十来个学生,使得并不宽敞的家里,时常回荡着朗朗的读书声。朱光潜在这种读书环境中,耳濡目染,自然对文字特别敏感和好奇。尤其是他的祖辈、父辈,都把读书作为唯一可以追求的价值目标和寻求上进的途径,这样一种执著的价值观——这是当时几乎绝大部分读书人所执著的价值观,也是儒家文化长期成为传统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充分表现——使得朱光潜四五岁就觉得识字读书是天经地义的事了。他两三岁就开始识字,而且表现出特别的聪慧,字形读音往往记得很快,甚至超过比他大几岁的小孩,经常在小学生们读书的地方听他们诵读,很多四书五经中的句子,熟听成诵。到了四五岁,他的态度已经颇为老成——少年老成,在当时家长的心目中,是有出息的征兆——周围邻居和私塾中的小学生,善意地戏称他为“朱夫子”,他自己也为此洋洋自得。不过父亲觉得他年纪还小,怕过早正式念

书会伤他的精神，就只是在平日里带他玩的时候，顺其兴趣，让他认认字而已。但是有一天，五岁的朱光潜的发问让他改变了主意。

那天，朱子香在私塾里叫几个大一点的孩子背诵《论语·述而篇》，几个学生背起书来摇头晃脑，很是流利，朱光潜在私塾的窗子外也跟着默念：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学生们背起书来朗朗上口，先生听着也高兴，于是兴致勃勃地讲起书来：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讲什么呢？这是孔子讲做人的道理，也是他教学生的纲。志于道者，是说要把道当做用功的目标；据于德者，是指要以道德为做人的根据；依于仁者，是说要靠近仁道、有仁心；游于艺则是说要熟练地掌握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孔子讲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教学生……

这时，先生突然想考一下学生，看他们是不是已经从《四书集解》的注疏中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指着坐在前面的一个十来岁的学生说：“你讲一讲，‘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什么意思？”被叫的学生腼腆地站起来，嗫嚅地答道：“孔子大概是说，不发愤的人不要去启发他，不是想讲话而讲不出来的时候，也不要启发他。”然后站在那里搔头挠耳，朱先生和蔼地说：

你讲的大体意思是不错的，只是‘不愤’的‘愤’字可不能这么解，这个‘愤’不是指发愤，是指心里想要弄懂而还没有弄懂的意思，孔子是讲，学生要到了想要懂而还没有懂的时候，想要说话而说不出来的时